

社會變化之策略

謝水養譯

有兩種方法說明可以達成社會變化：第一種認為個人的力量可成爲變化的來源；另一種變化是人類意志力的產物，由於人類自覺與有意的活動所產生的結果。例如，一九八九年東歐發生革命，可以看出一九八〇年代蘇聯發現到本身經濟死路，尤其決心要維持在東歐國家的把持力。逼迫着蘇聯生活多面發展與自由化。另一方面，政府的改變歸之於人民普遍升起抗議逼迫着老政權下臺。在社會科學裏稱之爲機構結構問題（structure-agency problem），是個很有權威性的爭辯：社會變化是社會結構改變的結果，個人無法控制，抑或是人的機構要負的責任？一九七七年馬克斯卡耳（Karl Marx）對於這問題提出一權威性的答案，他寫着：人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就不創造自己喜歡的歷史；在某種情況下他們不創造自己所選擇的，但却直接要遭遇、接受、傳送過去的歷史。

馬克斯在這一段落承認：結構與機構兩者的角色，就是要盡力設法解決問題，很清楚地，二者之間有一交互作用。例如，一九八九年葛雷克（Greig）辯稱：如果要想說明革命的發生，就必須注意結構因素（Structure factors）——經濟狀況及階級結構等，解釋有什麼可能會使革命發生，包括人民的信仰、活動、及人類目的，了解爲何會發生革命及其進行方向。

機構結構（Structure-agency）內人的地位影響到社會運動的方法，如一般性的力量視爲變化的主要來源，那社會運動是這些力量的產物，充其量是變化的仲裁者。問題是他們調查提議有關這種運動的本體與性質，他們的階級組成，運用策略能容納的結構界限，當然客觀的重要條件要存在。例如，因

爲經濟發展的步驟未加調整，致使環境遭受破壞升高而引發環境運動的有利機會。

另一方面，如果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那社會運動成爲改變自己權利的來源，他們採行的計策、所作的選擇，作了不同的結果。從這觀點，社會運動的分析有助於了解社會變化是如何完成的。

在此所強調的見解是：結果不是靠大規模社會力量預先決定，而是在特別情況下所採取策略及社會運動的方式所形成的。這一見解尤其似乎適合反對家庭暴力運動的情況。不像環境運動，可爭論的，它是因爲環境破壞升高而產生的運動，而反對家庭暴力運動，不是對女人暴力升高的一種反應。寧可說它是婦女運動以及社會分析產生一種副產品。這一觀點受到美國一個研究報告所支持，發現地方女性主義團體之存在，爲了整個美國受攻擊婦女比國民所得、政治自由主義、或存在着國家的家庭暴力立法更爲重要的一個社區計畫節目的預言者。反對家庭暴力運動，這種案例，似乎是婦女在創造自己的歷史。

本文主要目的，在反應運動使用之策略。從其他運動，尤其環境運動所使用策略的觀點之反應。

策略 (strategies)

新社會運動爲社會變化（和平、婦女、環境運動）所使用策略可分幾種方式。下列是現在最有用的，一九八四年馬丁（Martin）討論環境運動策略所

使用的修正方式。

1. 策略針對草根性變化 (Grassroots change)。
2. 策略針對獲得政府採行行動..
 - (a) 遊說 (lobbying)
 - (b) 選舉 (electoralism)
 - (c) 使用官僚政治 (bureaucracy)

這些方式可很清楚地分類，很多運動的活動會有多種方式。再者，有些策略，例如女運動員 (femocrats) 擬試圖改變公共服務裏文化事務及思想習慣，就要超越這一分類法而取捷徑。雖然如此，社會運動活動常依賴多種策略。以上兩種策略之間最主要之區別，一則草根方式，主要活動目的在直接影響個人行為及意識的改變，另一則在尋求說服政府進行改變。

草根方法 (grassroots methods)

草根方法目的在於動員一般民衆參與社會變化的過程。基本上他們參與形成新的羣體 (Groups)，或鼓動現有的社區羣體，商討議題並進行一些教育性活動 (如影片、討論等)。他們也包括一些行動如示威、遊行、寫信運動等。這些行動的目的不是在壓迫政府，雖然可能是種副產品，但是希望去影響社區裏的其他人能考慮議題並參加運動。當他們心中有這份目的時，有些運動可以理解到有不同的似乎非理性的運動。例如，反鈾運動要他們的地方政府宣佈非核子區，從純粹的工具觀點看，無法理解，因為地方政府與核子武器或能源毫無關連。但是藉着這樣一種運動提升知覺此項議題，也更能普遍刺激反核運動的增長。

最著名的草根戰術是所謂之直接行動 (direct action)。和平活動者試圖在軍事區表演靜坐抗議，環境保護人士試圖坐在推土機前面要求停止划木，婦女試圖堆集木頭並再表演靜坐方式，都是形成這種行動的例子。所謂直接，是直接阻隔要反對的活動或業務以達成運動之目的：如逼迫放棄划木，干預基地的操作，或藉着出席的抗議者堆集木頭等等。

大規模的直接行動能直接完成運動的目的，正如最近我們看到東歐，羣衆動員使得整個社會不能管制。但是，整體言之，他們更間接地有助於運動的目的。他們加深了羣衆參與獻身行為；在更大社會裏提高對這議題的知覺，甚至對政治家施加壓力。因此，直接行動，雖然在某方面是屬於草根計謀策略，但常常也是針對要影響政府策略的一部分。

上面直接行動的例子，包括人民不服從，就是向法律挑戰，並須應付警察。抗議者進行這種行動，最重要意念，就是將法律握在自己手中。可是，其他的直接行動，不是抗議，不與政府對抗。社區組織的環境清潔運動，是最為切題的例子。運動的活動者視這種運動為服務，不僅是表面上的清潔目的，也是一種教育性與建設性的作用。

草根策略的最好象徵，常與勞工運動有關。正如要解救福蘭克林河 (Franklin River) 運動的活動分析指出：

……要改變會破壞環境的經濟活動，唯有方法，就要結合資本或勞工努力奮鬥形成未來的投資策略……長期而言，工會是環境保護者要共同工作，努力去改變澳洲所設想之好經濟的最有希望的羣體。

在澳洲有一個歷史，試圖要形成聯合組織，有些成功，有些沒有。一九七〇年代早期雪梨綠色禁令，是個當地居民與建築商勞工聯盟之間的聯盟，防止開發者破壞居住鄰區。一九七〇年代晚期在澳洲最活躍積極的反鈾運動，尋求水邊工人及其他聯盟封閉鈾料出口。環境運動重複，因環境保護者的要求而使職業受到威脅的人，提供就業的一些建議方法，但有時，已太遲。就反對家庭暴力運動的案例，保護工人 (refuge workers) 一般都是很強的聯盟人士，依賴聯盟的資源以保證政府提供足夠基金去支付獎償工資。保護工人整合成為聯盟運動的方式，可使他們的成就鞏固並制度化。

獲得政府的行動 (Setting government to act)

既然新社會運動活動者堅信非階級參與之組織形式與決定，擬試圖說服政府實行改變，有某種意識型態上左右為難的窘境。但是，有時是唯一可用的途

徑。說服政府採取行動是靠遊說，也就是直接向決策者陳情，努力使他們信服並給他們壓力。婦女選舉遊說團即採此種策略。澳洲保護基金會派聯絡官駐坎培拉，其主要作用在遊說那些政客。遊說者理性的辯論有時也會贏得對方的行動承諾，但通常，要有效地遊說，必須靠某種可以攻擊的目標來支持，經濟的遊說用經濟手段，婦女及環境運動用選舉手段。沒有這些手段，則當有其他更重要的利益存在時，遊說也就無法發生效果。

選舉策略有多種。有一種運動，可公開所有候選人在相關的議題上之態度，促使支持者投票給支持運動目標的候選人，例如一九七二年婦女選舉遊說團所採行的，即是此種運動。或者能支持一個主要政黨，如野生學會（Wilderness Society）一九八三年試圖努力解救富蘭克林河（Franklin River）而支持自由黨（ALP）。如綠色黨在塔斯曼尼亞所安排，替候選人守備，成為獨立之黨派。或如解除核武政黨在各選舉時所安排的，成為新黨之代表。

選舉策略常包括運動目標之妥協。最近一個例子，塔斯曼尼亞綠色獨立黨必須讓步導使勞工黨在列表之區域作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作為換取其他目標如放棄破壞環境之木漿工廠規劃案。運動活動者另一種反對聲音，選舉策略不允許支持者轉移草根性權力給選出的領袖。這會破壞整個運動，再從一個現實的觀點看，經過一次疲勞的選舉運動之後，特別是如果被視為不成功，運動會暫時瓦解分裂。

關於使用官僚政治下層組織，以環境運動案列，州政府環境保護機構對運動目標已有些貢獻。然而這種機構全賴政府的決心及廣大運動的政治影響。一九八九年霍克政府建立的機構努力想調和環境保護者與開發自然資源工業界之間的衝突（假如環境保護人士能提出有效的辯解給委員會），資源評估委員會也會轉變為環境運動的官僚機構。

就婦女運動的案例，州及聯邦婦女事務辦公室，其官僚機構都參與婦女議題之推展。而且平等就業機會法庭對於婦女利益方面的改進貢獻甚多。

上面談論的，任何社會運動使用之綜合策略。現在我們要說明的是：事實上運動使用什麼樣的綜合策略去獲得動力？為什麼綜合性策略可採用，能否作

出結論；爲了要作比較，再重新研討反對家庭暴力運動之前，先研討解救富蘭克林河（Franklin River）運動所使用之策略。

富蘭克林河運動（The Franklin campaign）

一九八〇年代早期環境保護人士對塔斯曼尼亞（Tasmanian）政府及州的水力發電委員會（Hydro-electric Commission）現出激憤情緒，企圖阻止高登河（Gordon River）建壩，因為它會淹沒富蘭克林（Franklin）。其使用策略主要針對政府，開始對塔斯曼尼亞，後轉向聯邦。塔斯曼尼亞野生學會爲此運動打前鋒，開始集中遊說政客及社區教育，使用鮮艷的印刷品及影片去傳導美麗的原野河流，以產生好的名聲，取得媒體的注意。目標在於產生一種公共意見的氣候說服塔斯曼尼亞勞工黨政府拒絕水力發電委員會之計畫建議。可是政府堅信水力工業化政策是爲促進經濟發展的一種方法，不理會升高之羣衆意見反對水力發電委員會之計畫建議，政府內部有部分人不準備對環境保護人士讓步。意見不合的勞工黨另一部分人終究傷害到政府，結果於次年選舉，自由黨獲得了勝利。但是自由黨也是贊成建壩，於是在塔斯曼尼亞的議會策略失敗。

塔斯曼尼亞野生學會轉移注意到內陸，和內陸的團體結合，開始運動尋求聯邦自由黨政府干預，經過了一些痛苦掙扎之後，政府拒絕了。結果，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保守人士團體宣佈下屆州選舉他們要支持自由黨（ALP）及民主黨。他們盡其最大技巧與能力，目標針對特別的很可能受運動影響的邊緣選民。那麼，到了此一階段，運動採行的傳統選舉策略是希望有一個能同情他們的目標的政府能被選上。

同時塔斯曼尼亞野生學會有一段時間曾經想在工程開始時，計畫採取直接行動封閉建築工程。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工程開始，在附近道路，進行封閉行動。這確實是個草根行動，活動參加者來自澳洲各地。運動包括阻攔堆土機運到目的區以及道路建築本身。主要是種民間不服從運動，據說超過一千個抗議者被捕。但是封鎖者不希望嚴重妨礙到工程本身。封鎖開始而且最重要地是媒

體的事，小心佈署安排與監督，組織的人(organisers)向記者簡報，提供些戲劇性的抗議者與警察之間的對峙電視連續鏡頭的機會。實際上，封鎖是針對內陸的電視觀眾，這一點他們做得很成功：大眾在晚上能看到美麗的塔斯曼尼亞野性景色，以及封閉者戲劇性努力在拯救它。或許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影像來自於此運動的是一羣得意洋洋的小舟挑戰攜帶堆土機上高登河(Gordon River)的大型船隊。

自從封鎖行動發生以來漸次接近一九八三年三月間之聯邦選舉，這些事件的時間安排沒有把握更有利於環境保護者。終於自由黨獲得勝利，廣泛地知覺到解救富蘭克林之運動，特別是選舉策略之採用，轉變了選舉。新政府立刻阻止更進一步的工程建築，塔斯曼尼亞政府基於聯邦政府無憲法權力干預，因而向高等法院訴訟。法院終於決定，四票對三票，贊成聯邦政府，所以最後保守主義者勝利。

解救富蘭克林運動並非擬改變個人有關一般環境的行為與思想。不是尋求改變人民的消費習慣，而是為了完成更能維護較少環境破壞的生活方式，簡言之，不是尋求草根變化。乃是針對某一特別保守爭議點上可獲得政府的行動。因此，使用策略都指向政府而非一般人民。當然一般人是重要的，可被動服投票給某一特別政黨，但是目標還是要改變從上層所課徵之負擔而非從下層創造社會變化。

此運動雖有成功，可是引起了相當批評，環境保護活動者擔憂為了變化設立一個長期的運動，依照馬丁(Martin 1984)評論：「……採用選舉的方法，反對建壩運動耗盡了自己的力量，削減了跨黨的支持(割讓自由黨選票的保守份子)，不允許它的支持者，將建壩的命運歸之於高等法院，大眾的意見及活動者獻身沒有作用，最後整個關鍵在於一個人，即是高等法院法官的轉變，於是乎訴之於主要人物的途徑(appel-to-elites' approach)的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

馬丁勉強承認一種運動是要完成一項緊急而短期的目標，例如停止建壩，其目標適宜集中於政府。但是顯明的社會變化不可能發生，他辯稱：只要一種

運動固定於緊急威脅的目標，就需要政府立刻行動。這樣一種途徑，不能說是個人的行為與價值需要變化。使用一有利的運動口號，不能承認其為私事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他結論：當運動集中於草根動員時(Grassroots mobilization)，才會產生社會變化。

馬丁的立場，其原理是一貫的，事實上環境運動的發生，相當自然地，是一連串的緊急威脅，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如臭氣層穿洞，油輪漏油，地面的划木快速減少處女雨林，地下廢水污染了海邊等等。再者，馬丁可能了解到環境運動到達某一程度，在爭論這些議題時，將會慢慢地影響到個人態度與行為。廢紙回收的成長是草根變化的一個例子，它或許是因集中於緊急威脅所引發的，是否這一步驟會導致消費型態有更重要的基本轉變，只有時間能告知。有趣的是，馬丁主張的社會變化模式似乎更可應用於反對家庭暴力運動，那就是以下我們要探討的。

反對家庭暴力運動 (The movement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反對家庭暴力運動採用草根策略的程度比環境運動大。主要因為它的訴求不在於政府對於議題下決定，而是尋求社會上男女行為及知覺的改變。因此這種改變主要經由草根活動，政府只是扮演次要的角色，可是在整個過程中仍然是不可少的角色。

擔憂家庭暴力會因廣泛的婦女運動之草根知覺升高過程中而增長，以及整個國家婦女羣體行動達到頂點，建立保護所。這是對社會變化最直接行動的途徑。第一所婦女保護所在雪梨設立時，其行動也包括人民不服從，為的是要設立保護所，一羣婦女違抗法律佔據了空房。這種直接行動的目標與環境運動封閉有點不同，環境運動不希望以身體方式去阻止環境破壞，而是要給政府施加壓力；相反地，婦女參與保護所之設立，目標在使羣眾注意此議題，真正期望提供直接救援給那些受男性暴力的受害者。

很顯然地，家庭暴力無法靠政府的決定解除。但是政府可採取某種決定促使保護工作人員 (refuge workers) 的力量產生變化。最明顯地，政府可提供基金給保護所，政府也可改革法律促使法庭更有效地保護這些受害者。最後，他們靠運動如坎培拉的家庭暴力危急服務有政府的基金而成立組織。這些運動並沒有把責任推給政府去產生變化；政府的行動只是在促長草根的過程。

那麼，要使用何種策略的運動才能得到政府行動支持？第一遊說，雖然很少能實行，但是環境運動的專業化主義所採行的。第二選擇不是一件有利的策略。反對家庭暴力不是明顯的選舉議題，它既不佔有自己的候選人也不認同其他政黨。事實上，一九七二年選舉確屬例外，婦女選舉遊說團叱責所有候選人對婦女議題不關心的態度，整個婦女運動迄未依賴選舉策略去促進婦女運動，不過却也促成了某種選舉壓力，意義上，政治家一般都關心去吸引婦女的選票，自然也常同情婦女的議題。但是婦女運動跨政黨性質擬盡量排除使用選舉策略。

然而，反對家庭暴力運動的主要策略是透過官僚政治機構的運作。州及聯邦政府都有各類宣揚婦女議題的婦女單位。女運動黨員 (femocrats) 就是這些單位的職員，對於運動是個有利的條件，她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女運動黨員在政府內部促長提供保護所基金的要求，研究調查的一些特殊案例，如坎培拉家庭暴力危急服務組織的設立，女運動黨員加入保護工作人員 (refuge workers) 成為積極主動活動的夥伴以達成所需要的變化。

最後，我們應注意有些反對家庭暴力運動所採行的策略非在我們分類之類別內。由女性地位辦公處 (Office of the Status of Women-OSW) 所經營的教育運動成為靠政府帶動草根變化。這種策略對某些社會運動活動者而言似乎相當矛盾。

然而，我們觀察反對家庭暴力運動所採行策略混合與解救富蘭克林 (Franklin) 運動的混合方式顯然很不同。最大的不同是議題的作用。家庭暴力處在私人領域裏，不是公共競爭場所。所以它不能由政府決定就能簡單地排除；其所要求的是男人關心與關係到女人的一種基本改變。所以，很自然地，

反對家庭暴力集中能力於草根或社區的變化。另一方面，在富蘭克林建燭計畫，實質上，只有靠政府的決定才能打敗。所以，可以預知，富蘭克林運動一定是針對著去影響政府一種策略才能達成。

另一個結論，以我們曾經做過的比較，建議，不管所使用的混合策略，即使是草根策略的一部分，或者想經過媒體報導去影響選民，其直接行動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這兩種案例，從事於直接行動的人，都是變化的先鋒。這些活動的勇氣和獻身是運動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抗議者阻擋推土機或坐在高高的樹上抵擋警察的力量驅逐他們，而將許多的環境議題推入政治議題。沒有保護工作人員獻身於受暴虐的婦女，反對家庭暴力運動，也就不會有進步。

關於反對家庭暴力運動還有其他可以觀察的。它很清楚是婦女運動的自然發展，仍受該運動帶動，其他各種羣體與利益正當她們擴大運動超過女性基礎時也接納其議題。這些羣體所持有的家庭暴力觀點常與女性主義者分析不同，有時候甚至於有衝突。例如坎培拉家庭暴力危急服務的起源，婚姻顧問或指導者，法律改革機構、政客都扮演重要角色。這些羣體絲毫沒有一點外在可以看出關心女性主義的動機。同時也要注意，澳洲很多保護所是由宗教團體以及其他外屬女性運動的組織所經營。最後，是報紙，不時地在繼續討論這個議題，所處理的方式與女性主義者分析不一致。打擊太太被視為怪物、野獸，例外的人，完全不像絕大多數的男人。相反地，女性主義分析強調這些行為非正常人的行為，是一種長久以來男性尊長價值的表示。簡言之，反對家庭暴力運動範圍不僅只包括女性運動，縱使其他羣體依然受到感召加入行動。

反對家庭暴力運動的未來 (The future of the movement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反對家庭暴力運動之命運，有兩種明顯的可能性：變成合作型態，依賴政府提供基金，失去她們為求變化而運動的個性；或運動建立的組織變成一種改變社會的永久性特色。

在美國受暴行婦女運動已經是相當草根性的現象，澳洲則及時被政府接管，因為它依賴政府提供基金，所以也變成柔順了。保護所也逐漸由專業人士擔任職員，以傳統社會服務導向經營，不是以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其運動為要驅離社會男性尊長性質的批評，要求急進的社會變化。再者，美國被暴虐婦女運動成長，部分有賴媒體的注意，但難以避免的是媒體的興趣下降將削弱該項運動的影響力。

史貝特 (Speter) 與克得斯 (Kituse) 建議的另一種可能性，稱之謂社會問題四階段自然歷史模式 (four-stage nature history model)。第一階段，羣體過分要求他們的存在，致有某種冒犯之處。引發了第二階段來自官方機構的一些反應。第三階段是這些反應被原有訴求之團體認為不夠充足滿意，因此，第四階段，他們要靠自己的能力創造別種或平行的組織去處理該項問題。這種新的組織，例如：別種的報紙、別種的合作體系，單一議題之政黨組織等等。他們爭論的是這些發展代表重要的社會變化。這種模式細節顯現不能適合澳洲家庭暴力問題的緊急需要，澳洲的情況要比上述的合作體好一點，現建議如下：

澳洲反家庭暴力運動結果創造了一系列新的組織體，最著名的有很多保護所，從事於許多危急服務，如坎培拉的家庭暴力社區服務即是。特別是以社區為基礎組成的保護所，很多，但不是全部，是由女性主義者集體經營的。很可能因為一種同情女性的調和，女性主義保護所能抵制外來壓力變成傳統社會服務者，不在乎是接受政府的基金，堅持她們自己的目標，授權與婦女，並暗中破壞男性尊長習慣 (patriarchal practices)。事實上，我們所談論的保護所運動，她們可以控制加強她們的社會變化焦點。運動所進行的制度化過程會加強而不是減弱。

再者，在澳洲推展反家庭暴力的自覺，媒體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運動的過程不依賴媒體的興趣，這種情形，依照田尼 (Tierney) 的看法，在美國，事實上，也許缺乏媒體報導的手段，聯邦政府決定開始於一九八九年有它的廣告運動。

我們可以得到，在澳洲之反對家庭暴力運動，一部分因為女性運動員 (femocrat) 關係，該項運動繼續在進步中。在澳洲，國家從事於女性運動比別個國家走得前進一步。毫無疑問的，這僅是維繫運動動力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澳洲運動的進步主要依賴於草根工作人員及女性運動員之間的交互合作之夥伴關係，不在乎這種夥伴關係的因有的緊張與壓力，仍然是一股很有建設性、創造性的力量，那是因為這種合作關係成為運動成功的基礎，而非任何一個羣體的力量。

最後，由反對家庭暴力運動創立之組織，特別是坎培拉反對家庭暴力社區服務，更進而刺激機構之間如警察與法院交互作用的變化。我們探討坎培拉反家庭暴力社區服務已影響到法律制度，面對著要處理家庭暴力的分析，至少在較高階公務員當中，贏得了一些對分析的支持。運動所要爭取創立的組織現在已變成改變她們自己權利的機構。

反對家庭暴力運動的成就，可指引我們思考更廣泛的婦女運動，這一觀念之散佈，致使女性主義 (即男女平等) 之影響漸次衰微，說明如下：

「政府為婦女發動處理不平等現象是很重要的，但是婦女運動本身已失去原有動力。在本世紀初婦女為投票權運動，或者在一九六〇年晚期及一九七〇年早期婦女解放運動證明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時，它已不再有草根性的力量。」

確實，婦女運動不再是新奇或特別值得注意的新聞。但是如何判斷那是失去動力的要求，並不清楚。特別在一九八〇年代，反對家庭暴力的婦女運動的案例則是非常活躍積極。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草根性活動主義 (grassroots activism) 是運動過程中一很重要部分。至少在這領域裏，婦女解放仍是受公認的一股力量。

(本文作者現任職內政部社會司)

作者按：本文係譯自：The working for change,

Andrew Hopkins & Heather McGregor, 1991.